

➤ 文章题目：

《父亲育儿参与如何影响家庭消费水平？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 文章所属专业委员会领域：

【微观理论与行为经济】

➤ 内容摘要：

中国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不仅是扩大内需、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微观基础，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必由之路。本文从全新的父亲育儿视角切入，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8 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表明：①父亲育儿参与显著提高了中国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和高层次消费水平，且该结果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弱化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可信；②上述影响在家庭特征、父亲特征层面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年轻、高学历父亲的育儿参与行为对农村地区、大规模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③父亲育儿参与通过调整家庭生活支出决策人、促进母亲劳动供给和收入、增加孩子数量这三条路径，进一步促进了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因此，政府应鼓励和保障父亲参与育儿过程，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推动性别平等、家庭合理分工的观念普及，并大力满足居民各方面的消费需求，这不仅有助于贯彻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利于激发居民的消费潜能、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关键词：

父亲育儿参与；性别分工；家庭消费水平；高层次消费水平

父亲育儿参与如何影响家庭消费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胡雪萍 郑斯婕

内容摘要：中国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不仅是扩大内需、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微观基础，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必由之路。本文从全新的父亲育儿视角切入，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8 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表明：①父亲育儿参与显著提高了中国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和高层次消费水平，且该结果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弱化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可信；②上述影响在家庭特征、父亲特征层面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年轻、高学历父亲的育儿参与行为对农村地区、大规模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③父亲育儿参与通过调整家庭生活支出决策人、促进母亲劳动供给和收入、增加孩子数量这三条路径，进一步促进了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因此，政府应鼓励和保障父亲参与育儿过程，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推动性别平等、家庭合理分工的观念普及，并大力满足居民各方面的消费需求，这不仅有助于贯彻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利于激发居民的消费潜能、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父亲育儿参与；性别分工；家庭消费水平；高层次消费水平

一、引言

家庭的消费行为既能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又是中国现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生动力。自 2020 年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来，这一概念就受到了多方的关注与热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更进一步强调，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消费为主要引擎，推动其在畅通双循环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内需潜力来激发我国经济增长活力，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和总目标。消费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其影响力与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近年来在房价飞涨、疫情冲击、多国贸易保护主义等多重因素的干预下，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推动作用受到制约，经济增长贡献率由 2015 年的 69% 减少到 2022 年的 32.8%，拉动百分点也由 4.9 下降到 1.0^①。在此背景下，如何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成为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难题。家庭是经济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以此为切入点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路径进行深入探究，不仅有助于民生福祉的增进，更能

* 胡雪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430073，电子邮箱：hxueping@hotmail.com。郑斯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430073，电子邮箱：sijie.zheng@stu.zuel.edu.cn。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年度统计数据 <http://www.stats.gov.cn/>。

推动“双循环”发展格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中国大部分家庭将照顾孩子视为母亲的天职，但近年来这种观念正在转变，父亲育儿参与日渐形成一种趋势，或将成为激发家庭消费活力的新动能。在我国古代几千年的父权社会里，奉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这种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现代大部分家庭仍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即父亲承担着大部分的经济责任，只负责赚钱养家而忽略了对子女的陪伴，母亲依然是子女照料的主要负责人，其投入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多于父亲，“父职缺位、密集母职”的困境普遍存在于中国家庭内部。然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推动家庭走出上述育儿分工困境，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开放和养育观念的不断更新，儿童照料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有所增加（岳经纶和范昕，2018），与此同时，现代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劳动参与率、能力和地位显著提升，社会及家庭中男女平等的意识也逐渐觉醒，女性开始走出家庭、步入职场，面对子女照料和工作竞争的双重压力，母亲很难放弃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儿童养育当中，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不再适用（田艳芳等，2020），这些变化对于父亲的育儿参与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此之外，我国社会托育的公共服务也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岳经纶和范昕，2018），且随着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出台，家庭隔代照料资源将进一步紧缩，在此背景下父亲参与育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逐渐凸显出来，我国各地政府分别从2016年、2019年开始陆续出台的男性陪产假、育儿假政策^①，充分表明了国家对父亲育儿的重视与支持，父亲育儿参与的现象日趋普遍。

父亲是家庭中的核心成员，其参与育儿的会对家庭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可能提升了家庭消费水平：在家庭决策方面，父亲育儿使家庭传统的分工模式发生变化，各方面事物的决策人可能改变，从而直接革新了家庭的消费习惯（丁从明等，2020）；在家庭分工方面，父亲育儿部分地解放了母亲的家庭照料负担，使其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带来更多可支配收入，提高家庭总体消费能力（Marit & Ragni, 2015；王希茜和何宗樾，2022）；在家庭规模方面，父亲育儿分担了母亲生育孩子的压力，其生育意愿更高、子女数量可能增多，从而提升家庭总体消费支出（李京鸿等，2021）。综上所述，在传统家庭分工观念扭转、儿童养育压力日益加重、父亲育儿责任受到关注的社会背景下，从家庭内部人力资源合理分配的角度切入，分析父亲育儿参与如何影响家庭消费水平，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现实议题。

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家庭行为决策的微观视角，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问卷数据，实证检验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从父亲育儿的全新视角切入，研究中国家庭的消费行为问题，有助于扩展和丰

^①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25/content_5163309.htm；《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5/09/content_5389983.htm。

富家庭消费领域的研究范畴，引导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经济发展问题，为后续相关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次，基于不同维度的特征对研究样本进行划分，通过对比分析提供更细化的客观依据，同时也为如何有效刺激居民消费提供解决思路；最后，深入探讨父亲育儿参与影响家庭消费水平的潜在路径，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相应的参考性建议，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新视角。本研究有益于为推进家庭和社的男女平等、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和活力、实现内需扩大和高质量发展探寻有效的实践策略，帮助充分发挥家庭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为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赋予新动能。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针对家庭消费水平这一话题，既有文献主要围绕其测度方法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首先，衡量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指标，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立足于家庭总体的消费能力，采用年消费性支出总额（易行健和周利，2018）、人均消费性支出额（何兴强和史卫，2014）、平均消费倾向（杜莉等，2013）来进行度量。第二类对家庭消费支出进行了分项目、分类别的统计，以便于分析其结构性差异和偏好，如刘大为和李淑文（2021）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将家庭消费划分为衣、食、住、行、医疗、文娱、日常生活七项，用于对比分析居民在不同项目上的消费水平；谢家智和吴静茹（2020）按照由低到高的消费层次，分别统计了家庭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水平，为研究消费偏好提供支撑；于大川和赵小仕（2017）的研究将家庭消费区分为由日常支出构成的基础性消费和满足人类更高层次需求的高层次消费，有助于分析居民的消费结构和需求升级情况。其次，关于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从宏观经济环境及政策来看，经济下行及其所导致的失业预期（Thomas et al., 2013; Melvin, 2004）、城市房价（况伟大，2011）、国家税制及住房改革（徐润和陈斌开，2015；尹志超和甘犁，2010）等都会影响家庭消费水平；从中观家庭财富和结构来看，影响因素包括资产价值与债务负担（黄静和屠梅曾，2009；张雅淋等，2019）、收入及预期收入水平（Abdel & Foster, 1982; Carroll, 1994）、人口结构（郑妍妍等，2013）等；从微观个体情况和特点来看，家庭户主或财务掌控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个人偏好等特征（Thomas, 1990; Ge et al., 2018），以及成员的保险持有、劳动供给、退休情况（甘犁等，2010；肖国安和易雨瑶，2021；邹红和喻开志，2015）都会对家庭消费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都忽略了父亲育儿参与这一潜在的家庭消费影响因素。

近些年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思想解放，女性整体受教育水平、劳动参与率、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程度均显著提升，这一变化打破了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对父亲这一角色的期望开始发生转变，要求其更多地参与到养育子女的过程当中，因而父亲育儿参与及其所带来的效应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许琪和王金水，2019）。围绕上述话题，一些发达

国家的学者们最先展开了探索，研究发现父亲育儿参与会对母亲产后重返职场的可能性、产后抑郁症的缓解和生育二胎的意愿产生促进作用（Marit & Ragni, 2015; Fagan & Lee, 2010; Hwang & Kim, 2021），子女的各方面发展也会受到积极影响（Lamb & Pleck, 1985）。将视角转移到中国，国内研究者们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王希茜和何宗樾（2022）的实证分析指出，男性育儿参与在促进女性劳动参与率、工资收入提高的同时，并没有挤出男性自身的劳动供给，然而家庭的传统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这种效应；李京鸿等（2021）基于 2010—2018 年 CFPS 的面板数据构建 Logit 模型，以育有一孩的家庭为样本，分析发现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二孩生育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的作用路径是降低了母亲的生育成本；父亲育儿参与不仅帮助分担了母亲的照料负担、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积极作用（吴帆和王琳，2017），而且父亲自身在参与抚养的过程中所收获的正向情绪也大于育儿所带来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成熟、父子关系更融洽（徐安琪和张亮，2009）。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各个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革新家庭消费习惯、提升家庭消费水平，本文将从以下三条作用路径展开具体的理论分析。

（一）父亲育儿参与、支出决策人与家庭消费水平

父亲育儿参与会改变家庭生活支出方面的决策人，进而直接对家庭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对于双亲家庭而言，父亲若选择亲身参与到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意味着在该家庭的认知里，育儿并非母亲一个人的责任，这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性别观念的现代思想，有助于促进父母双方家庭分工的合理化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化（张亮，2014）。上述调整对于父亲在家庭日常生活、子女照料过程中的参与度和投入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其更容易关注到家庭、子女各方面的状况和需求，并在相关事物如消费支出的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Lamb，2000），而不像传统家庭里的父亲一样当“甩手掌柜”，对于家庭生活漠不关心。因此，父亲育儿参与与很可能提高其成为家庭生活支出决策人的概率。

既有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的消费习惯、观念和偏好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例如女性更愿意在购买商品时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的价格信息以做出最优决策，而男性的消费行为相对缺乏计划性（Laroche et al., 2000），这可能导致在购买相同的商品时，男性因掌握的信息不完全而花费更多；男性的物质主义倾向显著高于女性，会进行更多的炫耀性消费，即在购买商品时只看重财富价值而非性价比，导致男性的消费水平相对更高（王春晓和朱虹，2016）；男性在高端消费品方面也表现出更强的购买力，更注重商品的档次和品质，倾向于购买高端品以展现其自身的地位、品味、身份并满足自己的好胜心和自尊心，而这类商品的单价相对更高（王艳丽，2014）。上述性别差异意味着在父亲成为生活支出决策人后，家庭的消费行为将主要基于其男性特征而展开，倾向于购买价值更高的商品，从而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的提升。

此外，从消费内容来看，女性的支出通常集中于日常琐碎的事项上，更注重商品所提供的实际功能和使用价值，如食品是否健康营养、服饰是否美观舒适等；男性则更关注情感诉

求和自我欲望的满足，聚焦于汽车、住房、科技产品、教育、旅游等方面的消费，这类商品往往用于实现个人价值及精神文化追求，以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需求（王艳丽，2014）。因此，与女性当家的家庭相比，父亲主导下的家庭更重视发展享乐型需求，相应地提升了高层次消费水平。

（二）父亲育儿参与、母亲劳动供给与家庭消费水平

父亲育儿参与使家庭人力资源合理分配，有利于母亲加入外部劳动力市场，从而对家庭消费水平具有间接的影响。父亲承担起了本属于他的子女照料责任，帮助母亲从不平等的育儿压力中解脱出来，有效缓解了现代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冲突，能够有精力投入到职场中，对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劳动供给时间和工资性收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Patnaik, 2019），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 and 话语权也随之提高。与此同时，父亲适当地参与育儿并不会挤出其自身的劳动供给，也不会给父亲的工资水平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因而家庭总体的工资性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实现了父母“双赢”的局面（王希茜和何宗樾，2022；Frodermann et al., 2023）。

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消费行为的关键性因素，这一结论早已在经济学研究中达成共识，母亲的外部劳动力供给为家庭带来了长期、稳定的收入增长，在物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拥有更高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意味着更强的购买力和消费潜力，家庭内需收入的拉动下实现了有效扩大，其总体消费水平也将显著提升。

高层次消费品方面，在保证了最基本的衣、食、住等生存型需求后，家庭富余的收入使其有能力去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优的生活品质，需求逐渐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移，增加对医疗、教育、居住环境、娱乐等发展和享乐方面的消费支出，高层次消费水平实现升级（李翔和朱玉春，2013）。除了母亲工资性收入增加所引起的积极影响，肖国安和易雨瑶（2021）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通过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进一步实现了家庭总体消费水平的提升和高层次消费占比的增加，尤其显著促进了与子女教育相关的支出。

（三）父亲育儿参与、再生育意愿与家庭消费水平

父亲育儿参与对母亲的再生育意愿有积极作用，父母生育更多孩子的概率增大，子女数量增加必然会对家庭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父亲参与到孩子的养育过程中、提供子女照料支持，帮助分担了一部分的育儿压力，有效降低了母亲的育儿成本和生育焦虑，有益于营造夫妻共担责任的和谐家庭氛围，母亲生育二胎或第三胎的意愿显著增强（Cooke, 2004）。且在育儿过程中，父亲与子女之间频繁的互动交流使亲子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有助于提升婚姻的稳定性和家庭的幸福感，进而对夫妻的再生育决策产生积极作用（Kalmijn, 1999）。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部分欧洲国家为鼓励父亲照料子女而出台的育儿假政策，有效地提升了当地的人口出生率（Lappegård & Kornstad, 2020）。

父亲育儿参与使家庭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有所提高，更多的人口意味着家庭对各项商品的需求都随之扩张，因而推动总体消费水平的攀升。另外，王军和詹韵秋（2021）的研

究还指出，家庭中的储蓄动机与子女数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子女未来的赡养作用和养老保障将降低父母的预防性储蓄，激发当前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子女数量往往与家庭持有的房屋数量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房产增值致使家庭总体消费能力进一步增强。

子女数量对于家庭消费选择的影响还体现在，现代家庭非常重视子女的人力资本发展，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也逐渐强化，与之相关的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消费支出高于独生子女家庭（王军和詹韵秋，2021；张海峰等，2019）。子女数量更多的家庭对于住房面积、房屋数量的需求也相对更大，相应的住房消费支出水平更高（易成栋等，2018）。上述消费项目均属于发展型和享乐型支出，因此，家庭高层次消费水平将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而显著提高。

综上所述，父亲育儿参与可能通过改变家庭生活支出方面的决策人、促进母亲劳动供给、提高再生育的可能性这三条作用机制影响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和高层次消费水平。然而回顾国内外的文献，尚未有研究将父亲育儿与家庭的消费行为结合起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效应，更缺乏其中的作用机制分析，这为本文提供了可能的创新点和边际贡献。除此之外，与本文较为类似的研究证实了家庭的分工模式如隔代照料、夫妻家务分配等的确会对家庭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汤凌霄和潘文东，2021；符国群等，2020），这些观点为本文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参考。因此，本文将深入探究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探讨该影响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以期弥补此方面的研究空白及理论缺陷，试图从全新的视角出发，丰富和完善家庭消费行为领域的相关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的微观数据库，该调查自2010年起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导实施，旨在从社区、家庭、个体三个层面，反应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CFPS中包含社区、家庭、成人和少儿四种主体类型的调查问卷，涉及各个方面的详细信息，可以用于研究父亲育儿参与和家庭消费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采用的是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

为了研究父亲的育儿行为，本文所选择的研究样本为有0—15岁的孩子、孩子的父母处于在婚或同居状态的双亲家庭。其中，将孩子的年龄限制在16岁以下，主要是因为CFPS的少儿问卷仅适用于16岁以下少儿的父母代为回答，而本文的核心变量父亲育儿参与的相关数据主要源于该少儿问卷。对目标样本的数据进行清洗、极端值剔除和缺失值填补后，最终得到有效家庭样本4884户。

（二）基准回归模型设定

为考察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C_i = \alpha_0 + \alpha_1 fatherinvolve_i + \alpha_2 control_i + \mu_i$$

其中，下标 i 表示第 i 个家庭；被解释变量 C_i 为家庭的消费水平，本文将从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 $consumption_i$ ）和高层次消费水平（ $highlevel_i$ ）两个方面来进行衡量；核心解释变量 $fatherinvolve_i$ 是 0-1 变量，用于表示父亲是否参与到家庭的育儿过程中； $control_i$ 为一组可能影响家庭消费水平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个体层面的特征； μ_i 是随机干扰项。本文主要关注系数 α_1 的显著性和符号，它反映了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消费水平的作用效应。

（三）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家庭消费水平（ $consumption$ 、 $highlevel$ ）。为了更细化地考察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消费偏好及需求层次的影响，本文分别从家庭总体消费水平和高层次消费水平两个维度来进行测度。CFPS 问卷中将家庭消费性支出划分为食品、服饰、居住、交通通讯、设备及日用品、医疗保健、文教娱乐七项，将这七项消费支出加起来即获得家庭总体消费水平 $consumption$ ；另外参考齐红倩和刘岩（2020）的消费类型划分标准，将用于衣、食、住的支出定义为生存型消费，文教娱乐方面的支出定义为发展型消费，其余支出定义为享乐型消费，进一步地将发展型、享乐型消费支出合并起来定义为高层次消费水平 $highlevel$ 。为避免个别极端值对估计结果造成影响，在引入模型时，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了取对数的处理。

核心解释变量为父亲育儿参与（ $fatherinvolve$ ）。在 CFPS2018 年的少儿父母代答卷中，询问了“孩子白天或晚上最主要由谁照管？”、“平时最主要的是谁接送孩子去幼儿园/学前班？”这些与儿童照料方式相关联的问题，若上述问题中至少有一个回答是孩子的父亲，则认为该家庭中的父亲亲身参与到了孩子抚养的过程当中，将核心解释变量 $fatherinvolve$ 赋值为 1，反之则为 0。除此之外，参照王希茜和何宗樾（2022）的做法，我们基于相同的问题、以类似的方法构造了隔代照料（ $grandinvolve$ ）和社会机构照料（ $socialinvolve$ ）的二元变量，同时引入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也便于分析其他儿童照料方式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若至少有一个回答是孩子的祖辈，则将 $grandinvolve$ 赋值为 1，反之为 0；若孩子白天或晚上由托儿所/幼儿园/保姆照管，或者主要由保姆/校车接送，则将 $socialinvolve$ 赋值为 1，反之为 0。

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分别从家庭、个体层面控制了其他可能对家庭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净资产、转移支付、重大事件及人情礼净支出、商业保险支出、少儿及老年抚养比，户主的年龄、性别、户口、学历、健康状况等。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显示，父亲育儿参与（ $fatherinvolve$ ）的均值为 0.086，表明在研究样本的 4884 户家庭中，仅有 8.6% 家庭的父亲参与到了孩子的养育过程中，父亲育儿参与的

比例较低。相对而言，更多家庭的儿童照料方式是隔代照料和社会机构照料，占比分别为40.4%和12.5%。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父职缺位”的现象，父亲的育儿参与程度仍然有待提高。

表 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符号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总消费水平	lnconsumption	家庭总消费，取对数（元）	10.88	0.792	7.793	14.41
高层次消费水平	lnhighlevel	家庭高层次消费，取对数（元）	9.954	0.950	5.565	14.36
父亲育儿参与	fatherinvolve	是=1；否=0	0.086	0.280	0	1
隔代照料	grandinvolve	是=1；否=0	0.404	0.491	0	1
社会机构照料	socialinvolve	是=1；否=0	0.125	0.331	0	1
人均纯收入	lnperincome	家庭纯收入/人口数，取对数（元）	9.565	1.039	0	14.44
净资产	asset	家庭净资产（万元）	76.70	166.2	-99	5009
转移支付	lntransfer	政府补助、社会捐款、离退休或养老金总额，取对数（元）	4.561	4.011	0	12.72
重大事件净支出	bigevent	重大事件、人情礼净支出（千元）	4.587	10.96	-140	280
商业性保险支出	lninsurance	商业性保险支出，取对数（元）	3.409	4.140	0	11.51
少儿抚养比	kid_ratio	16岁以下人口数/16~59岁人口数	0.640	0.408	0	4
老年抚养比	old_ratio	59岁以上人口数/16~59岁人口数	0.297	0.428	0	4
年龄	hage	户主的年龄（岁）	45.68	13.04	13	90
性别	hgender	男=1；女=0	0.494	0.500	0	1
户口	hhukou	农业户口=1；非农业户口=0	0.763	0.425	0	1
最高学历	heducation	文盲/半文盲~博士：1~8	2.863	1.402	1	8
健康状况	hhealth	非常健康~不健康：1~5	3.011	1.194	1	5

更进一步地，按照父亲是否参与育儿的标准对全样本进行划分，分别对两个子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并检验两者间的均值差异，结果如表 2 所示。父亲参与育儿的家庭共有 418 户，它们的总体消费水平对数、高层次消费水平对数的均值都大于父亲不参与育儿的家庭组，且该差异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基于此可以初步判断，父亲育儿参与很可能提高了家庭的消费水平。除此之外，与父亲不参与育儿的家庭组相比，参与育儿组的隔代照料概率均值显著更低、社会机构照料概率均值更高，然而前者的均值差异绝对值大于后者，综合来看父亲育儿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其他儿童照料方式。控制变量中，参与育儿组的家庭净资产和少儿抚养比的均值显著大于不参与育儿组，且参与育儿组的户主平均年龄更低、学历更高，是非农业户口的男性的可能性更大。

表 2 分样本描述性统计及差异检验

变量	参与育儿组（418）		不参与育儿组（4466）		均值差异 (t 检验)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lnconsumption	10.992	0.812	10.865	0.790	0.126***
lnhighlevel	10.073	0.898	9.943	0.954	0.130***
grandinvolve	0.306	0.461	0.413	0.492	-0.107***
socialinvolve	0.182	0.386	0.120	0.324	0.062***

lnperincome	9.584	1.006	9.563	1.043	0.021
asset	90.281	175.116	75.426	165.292	14.855*
lntransfer	4.840	4.106	4.535	4.001	0.304
bigevent	4.439	8.022	4.601	11.194	-0.162
lninsurance	3.695	4.209	3.382	4.133	0.313
kid_ratio	0.706	0.444	0.634	0.404	0.072***
old_ratio	0.311	0.391	0.295	0.431	0.016
hage	44.289	11.322	45.805	13.178	-1.516**
hgender	0.715	0.452	0.474	0.499	0.242***
hhukou	0.691	0.462	0.770	0.421	-0.078***
heducation	2.983	1.566	2.852	1.385	0.131*
hhealth	2.964	1.235	3.015	1.190	-0.051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其中第（1）-（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总体消费水平的对数，第（4）-（6）列是高层次消费水平的对数，依次引入家庭、户主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拟合。结果显示，父亲育儿参与的系数在所有回归中均为正，且至少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父亲育儿参与显著地促进了家庭总体消费水平和高层次消费水平的提升。其中，在引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父亲育儿参与对两者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68、0.073，说明与父亲未参与育儿的家庭相比，父亲参与育儿使家庭总体消费水平和高层次消费水平分别高出6.8%和7.3%，对高层次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强。因此，父亲育儿参与有助于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和层次的升级。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总消费水平的对数			高层次消费水平的对数		
	(1)	(2)	(3)	(4)	(5)	(6)
fatherinvolve	0.109*** (0.041)	0.083** (0.034)	0.068** (0.034)	0.107** (0.045)	0.080** (0.039)	0.073* (0.039)
grandinvolve	-0.029 (0.024)	-0.013 (0.020)	0.005 (0.020)	-0.020 (0.028)	-0.010 (0.024)	-0.006 (0.025)
socialinvolve	0.224*** (0.032)	0.116*** (0.026)	0.095*** (0.026)	0.330*** (0.038)	0.226*** (0.032)	0.201*** (0.032)
lnperincome		0.246*** (0.023)	0.210*** (0.023)		0.217*** (0.022)	0.183*** (0.021)
asset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lntransfer		-0.004	0.000		0.003	0.006*

		(0.003)	(0.003)		(0.003)	(0.003)
bigevent		0.006***	0.006***		0.007***	0.008***
		(0.001)	(0.001)		(0.001)	(0.001)
lninsurance		0.049***	0.044***		0.065***	0.060***
		(0.003)	(0.002)		(0.003)	(0.003)
kid_ratio		0.056**	0.034		-0.054*	-0.066**
		(0.025)	(0.025)		(0.030)	(0.030)
old_ratio		0.042	0.075***		0.080**	0.097***
		(0.027)	(0.027)		(0.034)	(0.034)
hage			-0.005***			-0.002**
			(0.001)			(0.001)
hgender			0.008			0.006
			(0.019)			(0.024)
hhukou			-0.102***			-0.007
			(0.027)			(0.032)
heducation			0.046***			0.075***
			(0.009)			(0.011)
hhealth			0.037***			0.066***
			(0.008)			(0.010)
Constant	10.850***	8.219***	8.613***	9.912***	7.527***	7.552***
	(0.015)	(0.224)	(0.230)	(0.018)	(0.209)	(0.219)
Observations	4,884	4,884	4,884	4,884	4,884	4,884
R-squared	0.011	0.332	0.350	0.015	0.274	0.29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除此之外，控制变量的结果也基本符合预期，社会机构照料以及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净资产、重大事件和商业保险支出、少儿和老年抚养比会使家庭消费水平显著提高，户主的年龄、户口、学历和健康状况均会对家庭消费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内生性问题

父亲育儿参与并不是一个随机行为或随机分配的结果，而是父亲根据家庭及其自身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选择，因此，父亲参与育儿和未参与育儿的家庭之间可能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的选择性偏误会使得基准回归结果存在内生性问题。参考 Rosenbaum 和 Rubin (1983) 的做法，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PSM) 的方法来构造“反事实”的控制组，通过比较父亲参与育儿的处理组和与之匹配的未参与育儿的控制组在家庭消费水平上的差异，来判断父亲育儿和家庭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弱化上述因样本自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为了使处理组和控制组匹配的效果更好，在通过 logit 回归计算每个观测值的倾向性得分时，本文以父亲育儿参与的二元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相关的家庭特征（参照前文的控制变量）和父亲个人的特征变量（年龄、户口、学历、健康状况、是否工作）作为解释变量进行模型拟合，再基于计算的得分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方法进行样本匹配。结果显示，父亲育儿参与的行为显著受到家庭少儿抚养比、父亲户口类型和是否工作的影响，

且通过了 PSM 的平衡性检验、共同支撑假设检验^①，匹配效果较好。

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如表 4 所示，三种匹配方法的结果均显示，在控制了样本自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父亲育儿参与仍然显著促进了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和高层次消费水平，且对高层次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大，增强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信度。

表 4 PSM 方法的估计结果

家庭消费水平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差	t 值
总体消费水平的对数	最近邻匹配 (n=1)	10.987	10.859	0.128**	0.061	2.12
	半径匹配 (r=0.03)	10.987	10.896	0.092**	0.046	2.00
	核匹配	10.987	10.899	0.089*	0.046	1.94
高层次消费水平的对数	最近邻匹配 (n=1)	10.074	9.926	0.148**	0.070	2.11
	半径匹配 (r=0.03)	10.074	9.980	0.094*	0.051	1.85
	核匹配	10.074	9.987	0.088*	0.051	1.73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保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本文采用替换变量、改变研究样本等方法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同时考虑到文章篇幅，本节及后文将不再报告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若无特殊说明，控制变量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1、替换被解释变量

首先，将构成家庭总消费的七个项目的支出额（对数值）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5 所示。观察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发现父亲育儿参与对所有项目消费水平的影响方向均为正，尤其对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其中后三项均属于高层次消费支出。对比回归系数大小，发现父亲育儿参与对文教娱乐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强，使该项消费水平提升了 47.8%。因此，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仍显示，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和高层次消费水平的影响均为正，且对高层次消费水平的积极作用更大。

表 5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生存型（取对数）			高层次消费（享乐型、发展型，取对数）			
	服饰	食品	居住	日用品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文教娱乐
fatherinvolve	0.028 (0.063)	0.046 (0.042)	0.132** (0.063)	0.051 (0.070)	0.189* (0.115)	0.106** (0.043)	0.478*** (0.116)
Constant	4.884*** (0.364)	7.498*** (0.248)	6.255*** (0.280)	4.522*** (0.352)	3.823*** (0.492)	6.440*** (0.278)	3.246*** (0.605)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4,884	4,884	4,884	4,884	4,884	4,884	4,884
R-squared	0.198	0.252	0.102	0.248	0.066	0.235	0.123

^① 为节省文章篇幅，未报告相关结果，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改变研究样本、替换解释变量

考虑到孩子在 0-6 岁期间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更需要他人照料，而 6 岁以上的孩子基本开始进入小学接受义务教育，大部分的时间由学校照管，对父亲的陪护需求较低，因此本文将研究样本限定为最小孩子的年龄在 6 岁及以下的家庭，回归结果为表 6 的第（1）、（2）列。此外，观察发现样本中有些父亲的年龄过大或过小，最小的年龄仅为 18 岁、最大高达 64 岁，这部分父亲很可能不具备或丧失了亲自抚养孩子的能力，故本文剔除样本中父亲年龄最高 1%和最低 1%的样本，对得到子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为第（3）、（4）列。父亲育儿参与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除此之外，CFPS 的少儿问卷中还询问了孩子“是否有作业？”、“由谁辅导做作业？”，基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将研究样本限定为孩子有作业的家庭，并在原有的父亲育儿参与变量 *fatherinvolve* 的基础之上，拓展了核心解释变量的定义：若父亲白天/晚上照管孩子、或主要负责接送孩子、或辅导孩子做作业，则认为父亲参与了育儿过程，记新的父亲育儿变量 *fatherjoin* 为 1。回归结果见表 6 第（5）、（6）列，父亲育儿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进一步提高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 6 改变研究样本、替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6 岁及以下的孩子		剔除父亲年龄极端值		有作业的孩子	
	总消费 (1)	高层次消费 (2)	总消费 (3)	高层次 (4)	总消费 (5)	高层次 (6)
<i>fatherinvolve</i>	0.135*** (0.047)	0.159*** (0.054)	0.073** (0.034)	0.076* (0.039)		
<i>fatherjoin</i>					0.127** (0.053)	0.103* (0.062)
Constant	8.741*** (0.324)	7.636*** (0.269)	8.636*** (0.230)	7.543*** (0.220)	7.565*** (0.475)	6.702*** (0.593)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679	2,679	4,836	4,836	609	609
R-squared	0.348	0.291	0.351	0.293	0.406	0.346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异质性分析

1、根据家庭特征划分样本的分析

根据家庭特征划分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考虑到我国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习惯、思想观念等存在差异，本文根据家庭所在地进行城乡分类，划分后的回归结果是表 7 的（1）-（4）列，结果显示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总体消费水平和高层次消费水平的积极作用均在乡村地区更为显著。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城镇居民的家庭育儿、性别分工观念相对更先进，父亲育儿的现象在城镇地区更早地开始得到普及，大部分的城镇家庭早已习惯于这种非传统的男女分工模式，因此对城镇家庭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农村地区父

亲育儿参与的情况较少，大部分家庭囿于传统观念仍保持着低效率的分工模式，只要有细微的调整就可以给这些家庭的各个方面包括消费水平带来较明显的正向影响。

此外，样本的家庭规模均值和中位数均为 5 人，以此为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大规模和小规模家庭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7 的（5）-（8）列。父亲育儿参与对大规模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可能是因为大规模家庭所面临的照料负担更大，若这些压力都集中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更容易造成劳动力资源分配不合理的情况，而父亲参与育儿使大规模家庭分工合理化、均等化，将有助于家庭各方面的健康良性发展，对消费水平的积极作用也更为显著。

表 7 按照城乡、家庭规模划分的异质性分析

	城镇		乡村		小规模 (<5 人)		大规模 (≥5 人)	
	总消费 (1)	高层次 (2)	总消费 (3)	高层次 (4)	总消费 (5)	高层次 (6)	总消费 (7)	高层次 (8)
fatherinvolve	0.028 (0.043)	0.051 (0.051)	0.117** (0.054)	0.104* (0.059)	-0.019 (0.049)	0.015 (0.058)	0.113** (0.045)	0.094* (0.051)
Constant	8.383*** (0.349)	7.061*** (0.404)	8.935*** (0.293)	7.975*** (0.246)	9.162*** (0.324)	7.882*** (0.306)	7.764*** (0.215)	6.939*** (0.256)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305	2,305	2,579	2,579	2,186	2,186	2,698	2,698
R-squared	0.379	0.342	0.227	0.184	0.397	0.338	0.370	0.293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根据父亲特征划分样本的分析

统计分析得到样本中所有父亲年龄、学历的中位数分别为 37 岁和初中学历，以此为标准划分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8。从表中可以看出，年轻、高学历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总体消费水平和高层次消费水平的积极作用更强，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年轻的父亲有更多的精力来兼顾家庭和事业，能够为育儿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年长的父亲可能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对家庭照料的积极作用比较有限；接受更多教育的父亲更容易接受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愿意选择现代的新型家庭分工模式，也更懂得如何合理分配劳动力资源、如何科学育儿，其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进步对家庭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因而对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表 8 按照父亲年龄、学历划分的异质性分析

	年轻 (<37 岁)		年长 (≥37 岁)		低学历 (初中及以下)		高学历 (初中以上)	
	总消费 (1)	高层次 (2)	总消费 (3)	高层次 (4)	总消费 (5)	高层次 (6)	总消费 (7)	高层次 (8)
fatherinvolve	0.171*** (0.059)	0.195*** (0.068)	-0.004 (0.041)	-0.015 (0.046)	0.015 (0.046)	-0.001 (0.052)	0.150*** (0.051)	0.161*** (0.060)
Constant	8.060*** (0.277)	7.497*** (0.329)	8.833*** (0.273)	7.596*** (0.261)	8.347*** (0.258)	7.467*** (0.265)	8.932*** (0.331)	7.659*** (0.316)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631	1,631	3,253	3,253	2,445	2,445	2,439	2,439
R-squared	0.355	0.279	0.354	0.300	0.251	0.202	0.407	0.343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作用机制分析

前文研究发现，父亲育儿参与可以显著提升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和高层次消费水平，且上述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下面，本文将从生活支出决策人、母亲劳动供给、孩子数量三个方面切入，进一步探究父亲育儿参与影响家庭消费水平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见表 9。

父亲育儿参与促使其更多地加入到家庭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事物中，逐渐转变为家庭生活支出的决策人，从而直接影响家庭消费水平。具体而言，父亲亲身参与到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其责任就不再只是“赚钱养家”，在与孩子互动交流的过程中，父亲的家庭参与度、融入度、关注度均有所提升，更可能注意到家庭和子女的生活需求并参与这些事物的决策过程，成为家庭生活支出决策人的可能性增加，而男性的消费习惯、观念、偏好往往异于女性，在同类商品上的消费支出更高，更注重满足高层次的生活需求，因而有助于提升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和高层次消费水平（Laroche et al., 2000；王艳丽，2014）。表 9 的第（1）列以“孩子父亲是否为家庭生活支出管账人”为被解释变量，对父亲育儿参与变量进行回归，考虑到该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拟合，结果显示父亲育儿参与提升其成为家庭生活支出决策人的概率，且该影响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因此父亲参与家庭生活支出决策是父亲育儿参与影响家庭消费水平的渠道之一。

父亲育儿参与促进母亲的劳动供给和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家庭消费水平。父亲育儿参与使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分工更加合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母亲的家庭照料压力，有助于母亲参与外部的劳动力市场。如表 9 的第（2）-（4）列，分别以母亲是否工作、工作时间和工资性收入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父亲育儿参与决策为解释变量进行模型拟合，回归结果显示，父亲育儿参与显著促进了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且对其收入起到积极作用。家庭收入情况因母亲的劳动投入得以改善，对家庭总体消费水平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在满足基本温饱后，也更有能力去实现高层次消费水平的提升。

父亲育儿参与正向影响母亲的生育意愿，子女数量显著增加，人口规模的扩大促进家庭消费水平提升。父亲参与育儿能够降低母亲的生育成本，有助于构建幸福平等的婚姻和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提高母亲的生育意愿，子女的数量因此而增加。如表 9 第（5）列所示，以孩子的数量为被解释变量对父亲育儿参与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父亲育儿参与对孩子数量的影响显著为正。孩子数量的增加将促进家庭各方面的消费支出，尤其是与子女教育相关的消费水平有所提升。

综上所述表明，父亲育儿参与可显著改变家庭生活支出方面的决策人、促进母亲的劳动供给和收入、增加孩子数量，从而直接或间接提升家庭消费水平。

表 9 作用机制分析

	生活决策人	母亲劳动参与	母亲工作时间	母亲收入	孩子数量
	(1)	(2)	(3)	(4)	(5)
fatherinvolve	0.485*** (0.097)	0.401*** (0.110)	2.754* (1.625)	0.473*** (0.077)	0.151*** (0.039)
Constant	0.422 (0.410)	-0.531* (0.321)	31.180*** (6.874)	3.506*** (0.935)	2.211*** (0.15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4,884	3,183	2,377	1,349	4,884
Pseudo R2 /R2	0.623	0.058	0.028	0.186	0.262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的微观数据，深入分析了父亲育儿参与对双亲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总体消费水平和高层次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别使其提升了 6.8%和 7.3%，对高层次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强，且上述影响在考虑了由样本自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仍可信。第二，上述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按照家庭特征进行划分，父亲育儿参与对农村、大规模家庭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按照父亲特征进行划分，年轻、高学历父亲的育儿参与行为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更明显。第三，深入探究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消费水平的作用机制，发现父亲育儿参与通过使父亲成为家庭生活支出方面的决策人、提高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和收入水平、增加孩子的数量，从而提升了家庭的消费水平。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缓解女性育儿压力和生育成本、激发居民消费活力等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当前我国父亲育儿参与程度普遍较低，国家应当积极推出相关的法律或政策手段，保障各地男方陪产假、育儿假的落实落地，鼓励父亲深入参与到儿童养育的过程当中；其次，针对农村地区、二胎或三胎家庭、年长和低学历的父亲，政府应给予适度的政策倾斜，如准予更多的父亲育儿假期、相关的奖金激励，提供科学育儿方法教育或机构帮助，革新中国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平衡父亲育儿与工作之间的矛盾，缓解家庭育儿负担、提升生育意愿，有助于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再次，应推动性别平等的教育工作，提倡男女共同承担家庭照料责任，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科学的育儿观，宣传父亲育儿参与的各方面益处，解放女性的劳动力和育儿负担，促进家庭内部人力资源分配的合理化、平等化；最后，针对父亲育儿参与对家庭高层次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更强的研究结论，建议进一步完善社会医疗、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相关的公共服务场所和供给，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以满足居民的高层次消费需求，从而实现消费水平的持续增长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 丁从明、董诗涵、杨悦瑶, 2020:《南稻北麦、家庭分工与女性社会地位》,《世界经济》第7期。
- 杜利、沈建光、潘春阳, 2013:《房价上升对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基于上海市入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第3期。
- 符国群、姜海纳、张晓丹,《家务时间配置如何影响夫妻对家庭省时产品的购买》,《管理世界》第10期。
- 甘犁、刘国恩、马双, 2010:《基本医疗保险对促进家庭消费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期。
- 何兴强、史卫, 2014:《健康风险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经济研究》第5期。
- 黄静、屠梅曾, 2009:《房地产财富与消费:来自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第7期。
- 况伟大, 2011:《房价变动与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世界经济》第10期。
- 李京鸿、魏薇、解恩泽, 2021:《丈夫育儿是否影响家庭生育决策?——来自CFPS的证据》,《南方人口》第5期。
- 李翔、朱玉春, 2013:《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统计研究》第1期。
- 刘大为、李淑文, 2021:《互联网对家庭消费影响的结构差异——基于CFPS2018微观数据的分析》,《中国流通经济》第7期。
- 齐红倩、刘岩, 2020:《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2期。
- 汤凌霄、潘文东, 2021:《隔代照料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消费经济》第1期。
- 田艳芳、卢诗语、张莘, 2020:《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来自上海的证据》,《人口学刊》第3期。
- 王春晓、朱虹, 2016:《地位焦虑、物质主义与炫耀性消费——中国人物质主义倾向的现状、前因及后果》,《北京社会科学》第5期。
- 王军、詹韵秋, 2021:《子女数量与家庭消费行为: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财贸研究》第1期。
- 王希茜、何宗樾, 2022:《男性育儿参与、家庭传统文化观念与女性劳动供给》,《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9期。
- 王艳丽, 2014:《我国居民的消费性别差异分析》,《经济研究导刊》第23期。
- 吴帆、王琳, 2017:《中国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与政策需求——基于多源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第6期。
- 肖国安、易雨瑶, 2021:《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家庭地位与消费行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谢家智、吴静茹, 2020:《数字金融、信贷约束与家庭消费》,《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许琪、王金水, 2019:《爸爸去哪儿? 父亲育儿投入及其对中国青少年发展的影响》,《社会发展研究》第6期。
- 徐安琪、张亮, 2009:《父职参与对男性自身成长的积极效应——上海的经验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
- 徐润、陈斌开, 2015:《个人所得税改革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吗?——来自2011年所得税改革的证据》,《金融研究》第11期。
- 易成栋、任建宇、王优容, 2018:《子女数量、性别与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选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易行健、周利, 2018:《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金融研究》第11期。
- 尹志超、甘犁, 2010:《中国住房改革对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经济学(季刊)》第1期。
- 于大川、赵小仕, 2017:《社会养老保险与消费支出:来自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当代经济管理》第10期。
- 岳经纶、范昕, 2018:《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回顾、反思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 张海峰、梁若冰、林细细,《子女数量对农村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兼谈对“二孩政策”的启示》,《中国经济问题》第3期。
- 张亮, 2014:《推动男性家庭角色的改变——欧洲就业性别平等政策的新路径及对中国的启示》,《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 张雅淋、孙聪、姚玲珍, 2019:《越负债,越消费?——住房债务与一般债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经济管理》第12期。
- 郑妍妍、李磊、刘斌, 2013:《“少子化”“老龄化”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与产出的影响》,《人口与经济》第6期。
- 邹红、喻开志, 2015:《退休与城镇家庭消费:基于断点回归设计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1期。
- Abdel, G. M., and A. C. Foster, 1982, "Impact of Income and Wife's Education on Family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 Home Economics*, 6(1), 21—28.
- Carroll, C. D., 1994, "How does future income affect current consump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1), 111—147.

- Cooke, L. P., 2004,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Family Outcomes in German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5), 1246—1259.
- Fagan, J., Y. Lee, 2010, "Perceptions and Satisfaction with Father Involvement and Adolescent Mothers' Postpartum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9(9), 1109—1121.
- Frodermann, C., K. Wrohlich, and A. Zucco, 2023, "Parental Leave Policy and Long-run Earnings of Mothers", *Labour Economics*, 80, 102—296.
- Ge, S., D. T. Yang, J. Zhang, 2018, "Population Policies, Demographic Structural Changes, and the Chinese Household Saving Puzzl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01, 181—209.
- Hwang, W., S. Kim, 2021, "Husbands' Childcare Time and Wives' Second-birth Intentions among Dual-income Couple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Parenting Stress",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47(6), 850—859.
- Kalmijn, M., 1999, "Father Involvement in Childrearing and the Perceived Stability of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09—421.
- Lamb, M. E., 2000,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Father Involvement: An Overview",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29(2-3), 23—42.
- Lamb, M. E., J. H. Pleck, and J. A. Levine, 1985,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The Effects of Increased Paternal Involvement", *Advances in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229—266.
- Lappegård, T., T. Komstad, 2020, "Social Norms about Father Involvement and Women's Fertility", *Social Forces*, 99(1), 398—423.
- Laroche, M., G. Saad, M. Cleveland, and et al, 2000,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formation Search Strategies for a Christmas Gift",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17(6), 500—522.
- Marit, R., and H. K. Ragni, 2015, "Gender-Equalizing Family Policies and Mothers' Entry into Paid Work: Recent Evidence From Norway", *Feminist Economics*, 21(1), 59—89.
- Melvin, S., 2004, "Job Loss Expectations, Realization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Behavior",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6(1), 253—269.
- Patnaik, A., 2019, "Reserving Time for Daddy: The Consequences of Fathers' Quota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7(4), 1009—1059.
- Rosenbaum, P. R., D. B. Rubin, 1983,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 *Biometrika*, 70(1), 41—55.
- Thomas D., 1990,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An Inferential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5), 635—664.
- Thomas, F. C., L. Hamish, and O. Cormac, 2013, "Household Consumption through Recent Recessions", *Fiscal Studie*, 34(2), 203—229.

How Does Fathers' Parenting Involvement Affect Household Consumption Level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HU Xueping and ZHENG Sijie

(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Improving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Chinese household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icro-foundation for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double-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but also the way to seek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tarting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father parenting,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athers' parenting involvemen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level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in 2018,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①fathers' parenting involve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overall consumption level and high-level consumption level of Chinese households, and the results remain credible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weakens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②there is some heterogeneity in the above effects at the level of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nd father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arenting involvement behavior of young and highly educated fathers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rural areas and large-scale households; ③the parenting involvement of fathers contributes to the increase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level through the three paths of adjusting the decision maker of household living expenses, promoting the labor supply and income of mothers, 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children.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and guarantee fathers' involvement in the child-rearing process, provid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pport and financial subsidies,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and reasonabl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family, and vigorously meet residents' consumption needs in all aspects. This will not only help to implement the basic policy of gender equality, meet the people's needs for better growth, but also stimulate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resident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Keywords: fathers' parenting involvement;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household consumption level; high-level consumption level